

代價與成就並行

——江蘇省南通市人口發展所面臨的問題與啟示

◎ 陳友華

二十世紀70年代以來在中國城鄉廣泛開展的計劃生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它的推行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創造了不斷改善的人口環境，極大地緩解了歷史上長期形成的、世界上少有的沉重的人口壓力，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計劃生育使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人民生活質量、婦女地位等得到了明顯的提高。此外，計劃生育對於提高城市化水平、緩解和消除貧困、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但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中國的人口數量控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我們也已經為此或將要為此付出一定的代價。代價與成就並行。在中國的人口數量得到嚴格控制的同時，其他一些人口問題也相伴而至，並在部分地區初露端倪。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得到及時、妥善的解決，必將對中國的人口、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與可持續發展帶來諸多不利的影響。本文通過對江蘇省南通市人口發展的歷史、現狀與前景的考察與分析，以期揭示、研究與分析計劃生育先進地區目前及今後所遇到的一些不容忽視的新人口問題，希望能引起人們的關注與深思，並針對這些問題，及早地採取相應的對策措施，以便使中國的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在健康的道路上繼續前進。

一 基本情況

江蘇省南通市地處長江三角洲東北部，東瀕黃海，南臨長江，適當江海交匯處，稱江海門戶。南與上海、蘇州隔江相望，西與泰州毗連，北與鹽城接壤。自古為「崇川福地」，今有「長壽之鄉」美稱。下轄啟東、海門、通州、如東、如皋、海安等六縣（市）和三個區。2002年底轄區總面積8,001平方公里，常住總人口為780.25萬人，人口密度為975人／平方公里。

南通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沿海社會經濟較為發達的地級市，也是全國實行計劃生育最早、人口數量控制成效最顯著的地區之一。據2002年底統計資料顯示，全市完成國內生產總值（GDP）890.08億元，人均GDP 11,380元，財政收入87.41億元，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8,640元和4,133元。從1998年起南通市已連續5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出現負數，2002年人口出生率與自然增長率分別為6.72‰與 -1.71‰

二 人口發展現狀與前景展望

（一）人口自然變動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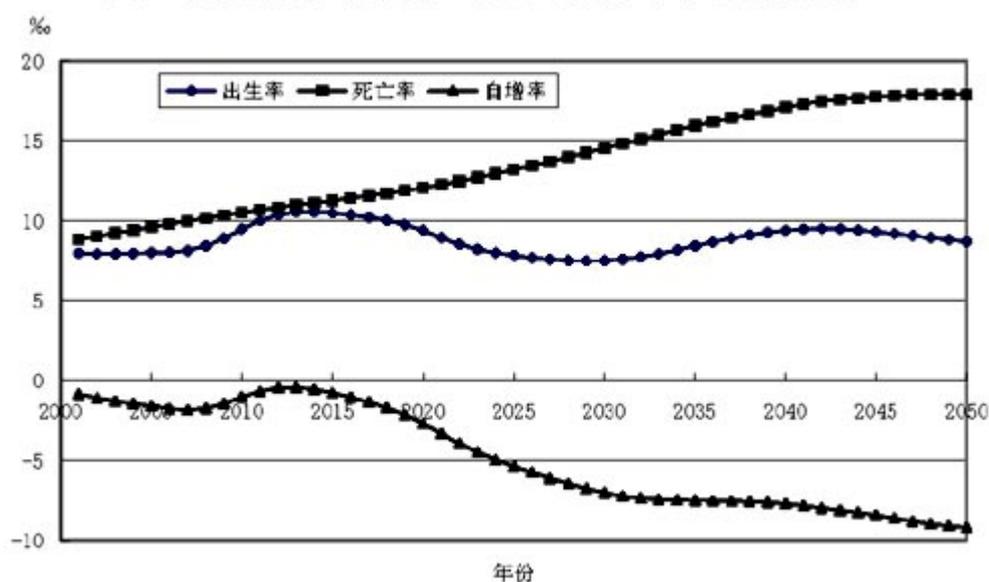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表明：1999年11月1日至2000年10月31日共出生50,672人，死亡59,468人，自然增長為-8796人，此間的出生率、死亡率與自然增長率分別為6.77‰、7.94‰與-1.17‰。

人口預測結果表明：南通市人口出生率在2013年前將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2012年時預計將超過10‰（10.36‰），2013與2014年時將達到最高值10.54‰。從2015年開始至2029年止，人口出生率轉又呈逐年下降的趨勢。總體上看，在未來的半個世紀時間內人口出生率在7.5‰—10.5‰之間徘徊波動。

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在未來的半個世紀時間內，人口死亡率將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2008年時預計將超過10‰（10.16‰），2020年時將超過12‰（12.05‰），2029年時將超過14‰（14.24‰），2036年時將超過16‰（16.19‰），2050年時將達到17.90‰。

在二十一世紀前十多年時間內，人口自然增長率將先降後升，大約從2014年開始，人口自然增長率將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預計到2025年時將超過-5‰（-5.36‰），2030年時將超過-7‰（-7.03‰），2050年時更是達到-9.23‰。由此可見，大約從2014年開始，南通市人口自然負增長呈現出不斷增加的趨勢。

圖1：南通市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與自增率的變動趨勢



（二）總人口及其變動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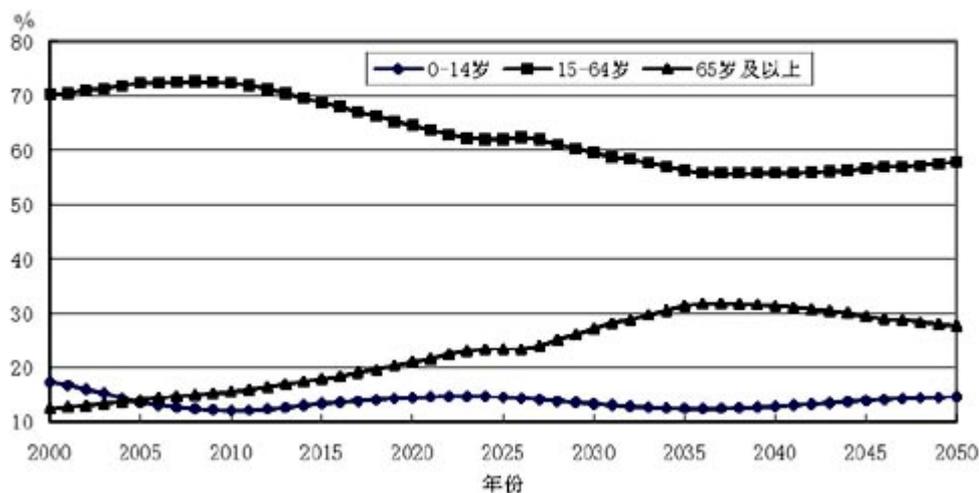
2000年時南通市總人口規模為751.3萬人。人口預測結果表明：在未來的半個世紀時間內，隨著時間的推移，南通市總人口規模將呈現出加速減少的趨勢。到2010、2020、2030、2040與2050年時總人口規模預計將分別下降至739.0萬、727.4萬、685.5萬、631.3萬與572.9萬人，分別相當於2000年人口規模的98.4%、96.8%、91.2%、84.0%與76.3%。

（三）人口結構及其變動趨勢

2000年時，南通市人口中男性人口佔47.8%，女性人口佔52.2%，總人口的性別比為91.71。人口預測結果表明：在二十一世紀的前四十年時間內，南通市總人口性別比將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預計到2012年時，總人口性別比將下降至不足90（89.90），到2038年時更下降到86.82，直到2039年時總人口性別比的這種下降趨勢才得以扭轉，並轉呈逐年上升的趨勢。

2000年時南通市0—14歲人口為1,300,250人，佔17.31%。根據預測，在二十一世紀的前十年時間內，少年兒童人口比例將呈現出快速下降的趨勢，到2010年時0—14歲人口所佔比例僅為12.08%。從2011年開始，少年兒童人口比例起伏波動，從總體上看，2011—2050年間少年兒童人口比例基本上維持在12.0%—14.5%的範圍內徘徊波動（見圖2）。

圖2：南通市各年齡組人口所佔比例的變動趨勢



2000年時南通市15—64歲人口為5,277,952人，佔70.25%。根據預測，南通市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在二十一世紀前五年時間內略有增長，到2005年時將達到540.1萬人，隨後呈不斷下降的趨勢，預計到2050年時將減少到331.1萬，不足現在的三分之二（62.73%）。

從比例上看，南通市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在二十一世紀的最初幾年時間裏將呈現出輕微的上升趨勢，到2008年時將達到72.63%，但從2009年開始的三十年時間裏，南通市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將轉而呈逐年下降的趨勢，到2039年時，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預計將下降到55.68%（見圖2）。

中國第三次、第四次與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表明：1982、1990與2000年時南通市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分別達到6.50%、8.99%與12.44%，且在未來的三十多年時間裏將呈現出持續上升的趨勢，到2034年時預計將突破30%（30.51%），並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見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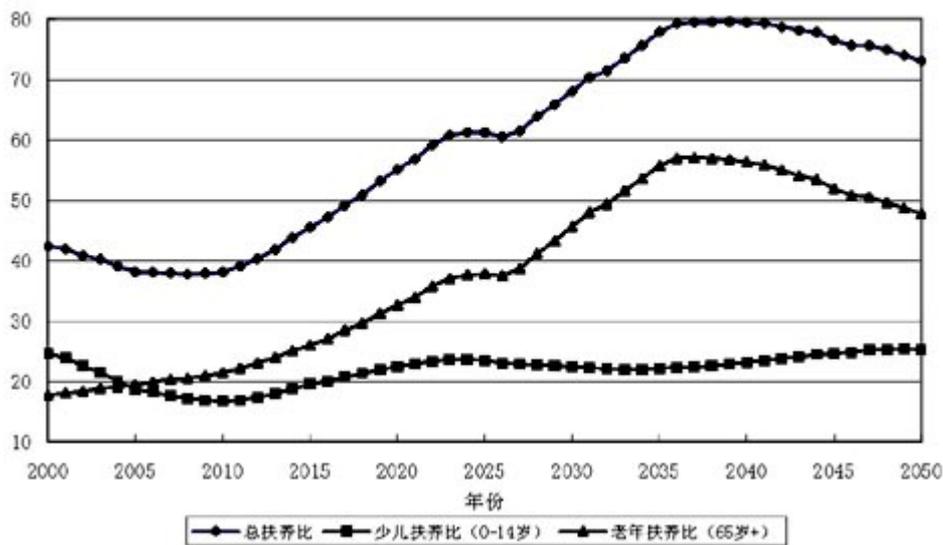
（四）撫養比及其變化

2000年時南通市少年兒童扶養比為24.64%。在2010年前，南通市少年兒童扶養比呈快速下降的趨勢，到2010年時，少年兒童扶養比僅為16.67%。從2011年開始少年兒童扶養比開始回升，2016年時預計將超過20%（20.07%），此後直到2050年時，少年兒童扶養比基本上在21%—25%的範圍內徘徊波動（見圖3）。

2000年時，南通市老年人口扶養比為17.71%。與少年兒童扶養比變動趨勢不同的是：老年人口扶養比在未來的近四十年左右的時間內將一直呈上升的趨勢，到2033年時已超過50%（51.56%），兩年後的2037年更是達到57.07%。由此可見，屆時老年人口的負擔是十分沉重的（見圖3）。

2000年時，南通市總扶養比僅為42.35%，並且在未來的幾年時間內總扶養比還將下降，到2008年時預計將下降到37.69%。但從2009年開始，總扶養比將呈現出持續30年的上升趨勢，預計到2039年時將達到接近80%的水平（79.58%）（見圖3）。

圖3：南通市人口扶養比的變動趨勢



三 問題與挑戰

南通市人口控制在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其未來的人口發展仍將會遇到一系列新的問題，南通市的社會經濟發展與人口發展因此將面臨一系列嚴峻的挑戰。

（一）人口老齡化加速與老年人口數量激增

2000年時65歲及以上人口為934,717人，佔12.44%。根據預測，南通市老年人口在未來三十多年的時間裏將快速增加，到2036年時，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預計將到207.5萬，是2000年的2.22倍。

2001年時南通市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經達到12.74%，高於或大大高於同期江蘇的9.1%與全國的7%的水平，與同期美國的13%接近，也與世界發達國家的14%差距不遠。根據預測，南通市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極快，到2015年時，南通市老年人口比例預計將達到17.86%，不僅大大高於同時江蘇與全國的平均水平，且明顯高於同期美國的水平（14.7%），並與人口老齡化程度比較嚴重的英國、法國與加拿大的水平比較接近（見表1）。再經過近20年的時間，到2034年時，南通市老年人口比例預計將超過30%，屆時將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見圖2）。

表 1：人口結構與生育率的國際比較

國家或地區	少年兒童比例	老年人口比例		總扶養比 (%)		總和生育率
	2001	2001	2015	1998	2015	1995-2000
世界	30	7				2.71
發達國家	18	14				1.57
發展中國家	33	5				3.00
美國	21	13	14.7	52.4	49.8	1.99
日本	15	17	24.6	45.4	64.3	1.43
德國	16	16	20.3	46.6	49.7	1.30
英國	19	16	18.7	54.0	54.1	1.72
法國	19	15	18.4	53.0	55.5	1.71
義大利	14	18	22.6	47.1	53.0	1.20
加拿大	19	13	16.2	47.0	48.7	1.55
俄羅斯	18	13	13.7	46.3	42.6	1.35
印度	36	4	6.4	64.1	47.3	3.13
中國	23	7	9.3	47.5	40.6	1.80
江蘇	19.1	9.1	12.5	39.8*	40.3	0.97
南通	16.6	12.7	17.9	40.9*	44.9	0.97

注：*為 2000 年的數位

需要注意的是：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南通的人口老齡化與老年人口高齡化是在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實現的，這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和社會保障體系很不健全的南通社會構成了極大的挑戰。在南通市人口老齡化的過程中還將出現勞動年齡人口老化問題，社會的創新能力與經濟活力可能因此而減弱。此外，人口的過度老齡化與老年人口數量的激增必將引起社會財富代際間轉移的增加，代際矛盾與衝突因此也會相應增加，等等。從而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某些不利的影響。

（二）婚姻擠壓問題嚴重

雖然南通沒有出現類似於全國那樣的持續二十年的出生性別比的持續升高，但自二十世紀70年代以來婦女生育率的持續快速下降已經對南通婚姻市場的供求平衡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表2分別給出了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南通男女單身與未婚比例隨年齡的變化情況。從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在1990年時，50—54歲及以下各年齡組男性單身與未婚比例要明顯高於女性相對應的比例，到2000年時情況依然如此，未發生任何實質性的變化。在中國，人們崇尚普遍結婚、且較早結婚的行為規範，男到30歲、女到25歲基本上都已結婚，30歲以後的志願不婚者極少。在這裏，從男女單身與未婚比例的對比分析中我們看到在1990—2000年間南通男性人口所面對的較為不利的婚姻市場環境所帶來的婚姻後果

表 2：南通市各年齡組單身與未婚人口比例及其變化

年齡組	1990				2000			
	單身人口比例		未婚人口比例		單身人口比例		未婚人口比例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5-19	99.31	97.06	99.30	97.04	99.95	99.42	99.95	99.42
20-24	70.68	53.38	70.60	53.28	74.98	54.03	74.88	53.87
25-29	15.17	4.04	14.77	3.75	14.87	4.35	14.13	3.70
30-34	7.92	0.67	7.16	0.25	6.48	1.21	5.18	0.37
35-39	7.03	0.86	5.95	0.20	5.37	1.37	3.82	0.22
40-44	6.58	1.83	4.85	0.19	6.30	1.82	4.49	0.14
45-49	7.46	4.05	4.79	0.22	6.98	2.91	4.71	0.13
50-54	8.59	7.91	4.07	0.25	7.38	5.98	4.09	0.11
55-59	10.46	14.61	3.11	0.26	9.05	10.87	4.24	0.20
60-64	13.75	25.09	2.46	0.31	11.32	18.65	3.62	0.17
65+	29.29	58.08	2.18	0.35	24.83	50.60	2.38	0.28

表3給出了1990與2000年南通市15歲時男女平均預期壽命及其在各婚姻狀態的分分情況。從中可以看到：兩性人口15歲時平均預期壽命與婚姻壽命在1990—2000年間均有了明顯的提高，但相對於男性而言，女性提高的幅度更大，從而使兩性人口15歲時的平均預期壽命及其平均預期婚姻壽命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1990與2000年時的婚姻壽命比較指數都為負數，且2000年時婚姻壽命比較指數的絕對值比1990年大得多（見表3），這意味著在此期間南通市男性婚姻擠壓問題不僅存在，而且呈加劇之勢。因婚姻擠壓使男性人口平均損失的婚姻壽命由1990年的1.26歲逐年增加到2000年的2.88歲（見表4）。參照有關標準（陳友華，2003），目前的南通婚姻市場已處在嚴重的男性婚姻擠壓之中。

表 3：南通市 15 歲時平均預期壽命及其在各婚姻狀態的分布

年份	合計			未婚			已婚			喪偶			離婚		
	男	女	男-女	男	女	男-女	男	女	男-女	男	女	男-女	男	女	男-女
1990	57.77	62.86	-5.09	10.95	7.82	3.13	42.30	43.56	-1.26	4.12	11.34	-7.22	0.40	0.14	0.26
2000	58.10	64.19	-6.09	11.20	8.10	3.10	43.35	46.23	-2.88	3.11	9.63	-6.52	0.43	0.22	0.21

表 4：南通市婚姻擠壓的度量

年份	曾婚比例比較指數	婚姻壽命比較指數	離婚壽命比較指數
1990	-3.85	-2.89	65.00
2000	-4.01	-6.23	48.84

實際上，嚴重的男性婚姻擠壓早已在南通出現。雖然普通百姓、尤其是來自廣大農村的普通百姓不一定具有相關方面的知識，但他們的確已經在現實生活中感受到來自婚姻市場的各種

壓力——相對於女子而言，男子成婚愈來愈困難，並採取了一些相應的對策。如在過去二十年多年時間裏，南通從雲南、貴州、四川與湖南等地通過各種途徑與方式引進的新娘愈來愈多，愈益加劇的男性婚姻擠壓矛盾因此而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由於其人口結構本身特點，南通婚姻市場上出現的嚴重的男性婚姻擠壓並未因此而有絲毫的減輕。

南通市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嚴重的男性婚姻擠壓及其相對於全國而言較為發達的社會經濟狀況，意味著由婚姻擠壓所導致的跨地區的婚姻遷移可能因此還將增多，而與婚姻遷移相伴隨的各地區與各民族人民之間的融合與婚姻的穩定性等因此將成為值得人們關注的問題，從而對社會的安定與個人的家庭幸福等帶來一系列的消極影響（陳友華，2003）。

（三）獨生子女教育與家庭結構的變化

獨生子女群體在南通的城鄉不僅早已大面積出現，而且首批獨生子女也於二十世紀90年代中期就已經進入婚育的行列。由於獨生子女成長的特殊環境可能造就的性格缺陷，獨生子女的教育問題早已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已經使南通市人口的家庭結構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多子女家庭急劇減少、甚至已經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小家庭與核心家庭（主要是獨生子女家庭），這應看作是一種社會的進步。但家庭規模的過度收縮也會帶來許多問題，如家庭養老功能的急劇弱化等。

無論從政策設計，還是從實際情況看，在家庭結構方面，擔心在全國範圍內出現高比例的「四二一家庭」確實是多餘的，但是在以南通為代表的一類地區，可能由於生育觀念的矯枉過正，即使生育政策允許，仍不能排除有許多年輕夫婦選擇終身只生育一個孩子甚至一個孩子都不生，從而導致「四二一家庭」，甚至「四二零家庭」大量出現的可能。

在家庭養老功能急劇弱化的情況下，國家與社會理應從家庭中接過或部分接過養老的接力棒，但由於受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可以預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國家和社會是難以承擔其養老的責任的。因此，國家一再宣傳、鼓勵與推行「以家庭養老為主，社會養老為輔」的政策。如此看來，以南通為代表的一類地區，由於計劃生育活動開展早，且卓有成效，將有更高比例的老年人在他們未來的晚年生活中可能處在一個孤立無援的境地——既指望不上子女，也極少能得到來自國家與社會的幫助，而只能依靠自己。這些問題在南通已經顯現出來。如隨著獨生子女進入婚育行列，身邊無子女的空巢家庭正迅速增加，這部分身邊無子女的獨身子女父母，在年老以後將不再能像他們的父輩那樣，基本上能從子女那裏獲得所需的經濟供養，特別是生活照料與精神慰藉等方面需求的滿足。

（四）人口遷移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儘管南通的社會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由於受多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與左右，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的事實：南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蘇南的差距正逐步拉大。但隨著包括蘇通大橋在內的一大批基礎設施工程的建設，南通的社會經濟發展環境將大為改善，並因此而加快融入上海一小時都市圈，從而在未來的幾十年時間內將迎來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相對於蘇南而言，南通在包括生產成本在內的優勢將逐步發揮出來。因此，在未來的二十年時間內，南通將面臨一個加速發展期。屆時，南通可能要重覆蘇南二十世紀90年代以後所走過的路。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加與嚴格的人口控制使二十世紀70年代以來的出生人數大量減少，在不久的將來，南通市可能出現勞動力資源不足，並且這種

勞動力資源短缺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顯露出來，因而大量的人口遷移與流動將不可避免。大量外來人口的流入在為南通市的社會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時，也會帶來其他一系列問題。對此，我們必須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

四 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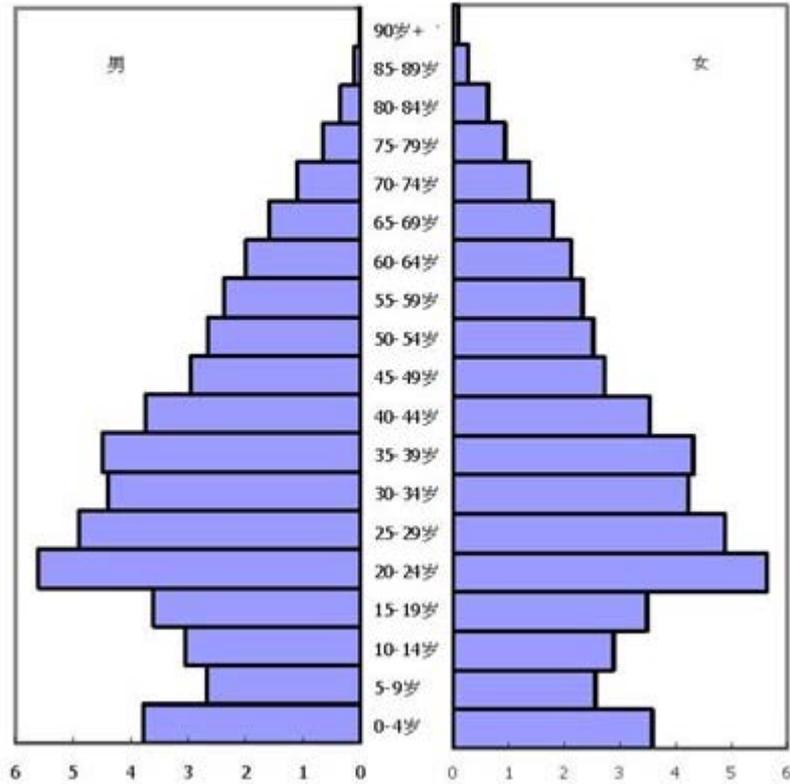
早在二十世紀70年代中期，南通市婦女的生育率就降低到了更替水平，這比全國整整早了近二十年的時間。更為突出的是南通市婦女生育率在下降到更替水平以後，並沒有在更替水平上徘徊波動，而是進一步持續快速下降，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南通市婦女的生育率已下降到1.5，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更是降低到不足1的水平（雖然實際生育率可能要高於這一數位，但超低生育率水平格局在南通早已形成已是不爭的事實）。在一個農村人口佔大多數、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仍較低的南通社會，近幾十年來婦女生育率的變化歷程卻與全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上海市極為相似，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南通市的計劃生育工作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為全國人口的數量控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南通市長期的超低生育率（ $TFR < 1.5$ ）已經並仍將給南通市的人口、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在過去的二十年時間裏，南通走的可能是一條人口、經濟與社會不可持續發展之路。為了應對社會經濟發展與人口發展所面臨的各種問題與挑戰，南通市可採取的應對措施主要有如下兩個：

（一）生育政策的調整

毋庸置疑，南通市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在成就的背後我們也為此付出或將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將圖4、圖5與圖6進行一下對比，我們不難發現：長期的超低水平的生育率已經使南通市的人口年齡結構趨於惡化。由此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南通市人口數量控制巨大成就的取得在某種意義上是以犧牲人口結構的合理性作為代價的，而且這種超低生育率水平維持愈久、人口數量控制愈嚴，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合理性所帶來的危害將愈大。

圖 4：1990 年南通市人口金字塔（佔總人口的%）



因此，為了盡可能減小南通人口發展對人口、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與可持續發展帶來過多的負面影響，以南通為代表的一類地區的生育政策的調整已經不是需要不需要的問題，而是必須馬上進行調整的問題（在筆者看來，即使現在進行生育政策的調整，從時間上考察，我們可能也錯過了最佳的調整時機）。通過生育政策的調整，希望使南通市婦女的生育水平由目前的超低水平逐漸回復到略低於更替水平（如1.9左右）。在這方面，社會經濟發展相對滯後的山西冀城、河北承德和甘肅酒泉的許多成功經驗是很值得南通市認真學習與借鑑的（張純元，2000）。

圖 5：2000 年南通市人口金字塔（佔總人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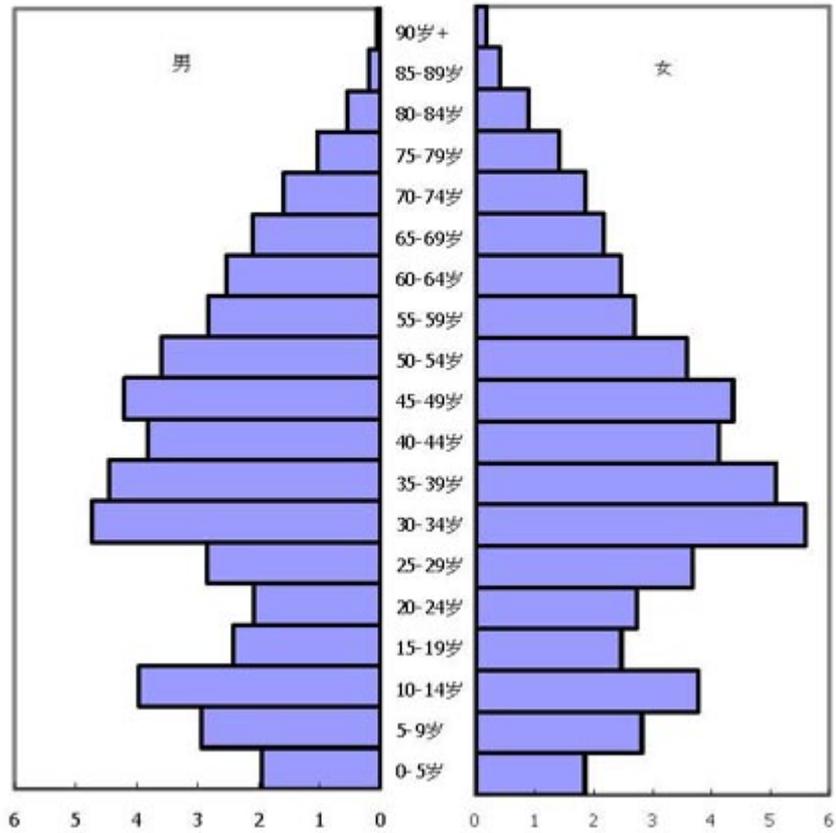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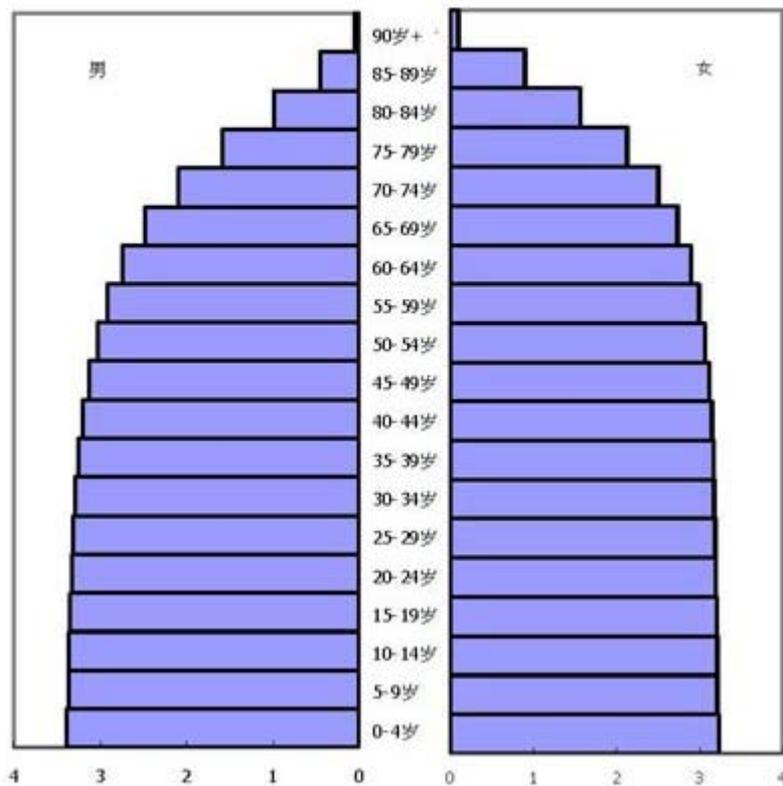


圖 6：合理人口結構人口金字塔（佔總人口的%）



（二）人口遷移

如果任憑南通市婦女的超低生育率長期發展下去，今後因此而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與挑戰恐怕是南通市人口本身無法獨立承擔的。為了減低超低生育率所帶來的出生人數嚴重不足給南通市的人口、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實行替代人口遷移戰略可能是南通市未來的必然選擇。德國、義大利與法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為了彌補生育率不足給本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紛紛採取替代人口遷移戰略，在這方面的某些做法是很值得南通人學習與借鑑的。

當然，在南通市未來的人口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最大問題還是社會養老保障及其可持續性問題。除了上述的兩個應對策略外，可以考慮的措施還包括推遲退休年齡，通過改進對養老基金的管理來提高其保值增值的能力，被迫降低基本養老保險的替代率，並進一步發展多種形式的補充養老保險等（左學金，2000）。但這裏牽涉到的許多政策層面的問題是全國性的，在這些方面南通市的可為空間很小。

五 對某些人口問題的認識與思考

通過對南通人口發展歷程的考察與前景的展望，使人聯想到許多與南通、乃至整個中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人口問題，並加深了對某些人口問題的理解與認識。

（一）少生並不意味著一切

飽嘗人口過快增長之苦的中國民眾，自然會比他人多一層對計劃生育重要性與緊迫性的理解與感性認識，以至於計劃生育在中國被確定為一項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再加之經過數十年的宣傳教育，目前已形成一種思維定勢——出生人數愈少愈好，政府主管部門的部分領導同志甚至也抱有這樣的想法。這裏牽涉到兩個基本的問題：一是計劃生育的原有之意究竟是甚麼？二是少生是否意味著一切？

計劃生育的原有之意究竟是甚麼？這個在某些人看來簡單、甚至不值一提的問題，在筆者看來很有深究的必要。筆者認為：計劃生育絕不是生得愈少愈好、更不是不讓生育，而是要求按政策生育。這裏實際上至少應包含三層含義：首先，生育權是最基本的人權。任何情況下夫婦都有生育孩子的權利；其次，夫婦生育的孩子數量不應超過政策所允許的範圍；第三，夫婦也有義務完成政策所賦予的職責，生育規定數量的孩子。但大多數人只認識到政策的前二層含義，而根本沒有意識到還會有第三層含義。目前，西方社會流行的終身不育的做法，實際上是將生育和養育後代的責任轉嫁給他人和社會的一種只謀求自身發展、甚至貪圖個人享受而不願承擔人類繁衍任務的一種自私行為，根本不應予以提倡。讓人吃驚的是：大約三年前作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某特大城市的計劃生育主管部門甚至還提高了對獨生子女夫婦自動放棄生育二孩的獎勵標準，「四二一」家庭結構似應看作他們追求的目標，同時也是一種典型意義上的「出生人數愈少愈好」思想的真情流露。

並不是因為獨生子女好才推行獨生子女政策，而是因為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中國才選擇推行獨生子女政策的。從任何角度考察，獨生子女及其家庭都有其自身難以克服的弱點，因而中國在推行獨生子女政策之初就明確指出獨生子女政策是一代人的政策。與一代獨生子女家庭結構相比，「四二一」家庭結構（兩代獨生子女）顯得更加脆弱不堪。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如

果成千上萬個細胞都出了問題，相信這個社會必將出現大的問題。因此，無論是從人類自身發展，還是從人口、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與可持續發展角度考察，「四二一」家庭結構不應成為我們所追求的目標，恰恰相反，這是我們力圖回避的。因此，著力於獨生子女家庭結構的重建應該成為生育政策調整時優先考慮的內容（陳友華等，2003）。

出生人數是否愈少愈好？或者說少生是否意味著一切？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雖然我們很難作出在目前情況下婦女生育率具體保持在一個怎樣的水平上對中國的人口、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與可持續發展是最為有利的，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婦女生育率過度偏離於更替水平（如 $TFR > 2.5$ 或 $TFR < 1.5$ ）對人類自身發展或人口、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與可持續發展都是十分有害的。目前的歐洲與中國上海等大城市和南通等少部分農村地區就出現了這種情況。但遺憾的是人們對生育率過高的危害普遍有比較清醒的認識，而對生育率過低的危害卻普遍存在認識上的不足。長期地看，穩定人口（更進一步說是現代靜止人口）對人口、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與可持續發展無疑是最為有利的。因此，力爭保持出生率的均衡發展，努力避免婦女生育率過度偏離於更替生育水平，則是人口控制工作中要引起注意的一個重要問題。目前，上海等大城市和南通等少部分農村地區出生人數的極度收縮未必是一件好事。依筆者看來，這些地區今後要面臨的已不再是生育過剩，而是像義大利、德國等西方國家正面臨的生育不足的問題。代之以自然變動，遷移變動在這些地區的人口發展中將扮演主要角色。

（二）人口問題的多維性

人口問題不僅僅是一個數量問題，而且還有人口結構與人口質素問題。某一人口問題並不是短時間內形成的（如中國人口數量過多問題），同樣，人口問題也不是短時間內就可以解決的。而且在某一人口問題的解決過程中，還會伴隨出現其他人口問題。

也許是出於對解決中國人口數量問題心情的急切，我們中的許多人曾寄希望於在短時間內解決中國人口數量過多的問題。急躁病是我們中國人最常犯、並仍然繼續再犯的一個老毛病（如目前全國許多地區紛紛提出率先全面實現小康與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甚至提出其實現時間表，在筆者看來，這其中的大部分地區已完全脫離了當地的實際。實際上，如果對照十六大報告的有關內容，不用說發展水平仍很低的中國，就是西方某些發達國家可能距離全面小康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以往我們對人口問題的關注更多地集中在人口的數量上，恨不得在短時間內就能將中國人口數量過多的問題解決掉，在這種心理驅使下已經使我們在人口控制問題上走了一點彎路。如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的推出與1984年生育政策的調整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由於將過多的注意力集中於人口的數量，從而忽略了對人口結構與人口質素問題的關注。

如果說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人口過剩的擔憂和控制人口數量是我國人口政策的重點的話，那麼在下世紀人口問題將愈來愈成為一個多維的問題。人口數量控制將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許多目前已初露端倪的問題將進一步發展與深化（左學金，2000）。

（三）生育觀念轉變與生育率轉變

這裏有兩個問題需要澄清。第一個問題是：甚麼是現代的生育觀念？在這一問題上許多人可能存在著認識上的偏差。例如，目前許多人簡單地將按政策生育作為自身的生育意願看作或

等同於現代生育觀念，甚至認為孩子生得愈少愈好，這顯然是有問題的。在筆者看來，「晚婚晚育、少生優生、無性別偏好」才是構成現代生育觀念的主要內容。

第二個問題是：現代生育觀念是否一定對人口、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有利？這裏不僅牽涉到對現代生育觀念的價值判斷，還牽涉到現代生育觀念究竟給我們人類帶來了甚麼的考量。

人們的生育觀是長期形成的，並最終在生育行為上表現出來。這種生育觀一經形成，具有很強的慣性，要想在短時間內徹底改變是極其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中國自推行計劃生育工作以來，人們的生育觀念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體現在期望生育子女數的減少。如果就全國整體而言，人們生育觀念的轉變還不徹底或者未發生根本性的轉變的話，作為計劃生育開展最早、成效又異常突出的地區之一——南通，人們生育觀念可以說是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與現實告訴我們：一旦完成了生育率的實質性轉變，生育率水平的逆轉變（即從低水平轉向高水準）是極其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至少目前世界上還沒有這方面成功的先例）。這也就是為甚麼法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雖然在積極推行鼓勵生育的政策，但婦女生育率仍呈下降趨勢的原因（陳友華等，2003）。

南通地區人們生育觀念的轉變是革命性的，而生育率的轉變也是徹底的或根本性的。即使取消對生育數量的任何限制，可以預期，南通市婦女的生育率雖然也會因此出現明顯的回升，但要回復到更替水平以上是絕難想像的。經過長期的、一貫的宣傳教育，在南通市普通百姓的頭腦中已經形成了上海等大城市才出現的少育、甚至不育的生育文化，而這種生育文化本身將對南通市未來的人口發展產生深刻而長遠的影響。

筆者認為，至少在南通的部分地區（例如如東縣），在生育觀念的轉變過程中存在矯枉過正的問題，以至於在南通過早地出現少育、甚至不育的生育文化。只生一個孩子可能成為未來南通婦女生育的主流，如果任其長期發展下去，人類社會的延續都將成為問題，更不用說是可持續發展了。現在，南通已經在複製義大利、德國與法國等歐洲國家人口發展的歷史，儘管形成南通市人口發展歷史的原因與西方發達國家是極不相同的。但不論原因為何，事實證明這種人口發展是沒有前途的。

由此看來，我們在宣傳教育、引導群眾的生育觀念轉變這一問題上，確實有許多值得我們認真回顧與反思的地方。例如，以往提出的「只生一個好」、「生男生女都一樣」等，筆者反覆琢磨，至今仍未認識到「只生一個好」究竟體現在哪裏？「生男生女都一樣」對農民兄弟來講似乎就是「不一樣」。

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正是由於南通發生的生育觀念與生育率的革命性與徹底性的轉變，使得南通市政府對未來人口調控的能力將不斷減弱。

（四）穩定低生育水平

儘管在對中國目前生育率究竟處在甚麼水平上存在著不少爭論，但這並不意味著大家對當前婦女生育率水平沒有一個大致的估計。中國目前的生育率在1.8—1.9之間，已經處在更替水平之下，對此大家已形成共識。

在世紀之交，當中國婦女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時，黨中央、國務院適時作出了「關於

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穩定低生育水平首先是低於更替生育水平，是一種遏止人口繼續增長的生育水平；其次，穩定低生育水平是穩定目前的總和生育率1.8—1.9的水平，而不是繼續追求更低的生育水平，這樣就避免了一味追求生育數量愈少愈好的傾向（李建新，2000）。為使人口的慣性增長盡早地停止下來，長久地保持一個略低於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必要的，甚至可以稱之為一項目光遠大的戰略性措施（穆光宗等，1998）。

穩定低生育率水平是在全國的生育率水平在1.8—1.9的情況下作出的，1.8—1.9的生育率距離更替水平不遠。因此，就全國的情況來看，穩定目前的低生育率水平與保持生育政策的基本穩定不變是必要的。但這決不意味著所有的地區都有維持目前生育率水平的必要，也決不意味著部分地區沒有對現行生育政策進行調整的必要。相反，那些生育率明顯高於更替水平的地區的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甚至略低於更替水平是完全必要的，而與此同時，生育率長期處於超低水平（TFR<1.5）的一類地區，則必須對生育政策適時地作出必要的調整，以使生育率逐步恢復到略低於更替水平。

國家人口與計生委張維慶主任最近提出了「人口安全」的概念。筆者認為「人口安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這對於我們全面認識人口問題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在筆者看來，婦女生育率長期維持在超低水平上，已經對人口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因此，筆者認為，作為一個地區的南通區域生育政策調整不僅非常重要，而且不能再拖下去了。不然的話，我們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五）人口數量與人口結構——矛盾的兩個方面

在人口的變化中，規模與結構的變化最引人注目。從1973年開始的轟轟烈烈的計劃生育運動，直接目的就是降低人口增長率，減緩人口規模的擴大速度。

作為生育率下降後果之一，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卻出現了老齡化的趨勢。無論是人口總量的繼續擴大，還是人口老齡化的加速，對未來的中國都是嚴峻的挑戰。人口數量控制愈嚴格，人口老齡化速度愈快，老齡化狀況愈嚴重。如果放棄人口控制政策，令生育率反彈和上升，人口總量雖然會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但是人口老齡化的進程卻會因此而放慢。面對人口規模和人口老齡化的雙重挑戰，我們該如何清醒地認識這對矛盾，明智地選擇應對政策，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重大而急迫的問題（翟振武，2001）。

因此，人口總量控制與人口年齡結構老化是一對矛盾。在對人口進行控制時，必須全面考慮數量與結構兩方面的問題，力求找到一個最佳平衡點，使總的負面影響達到可能的最小值。因此，在控制人口總量的同時，並不排除對某些地區、某些城市的生育率進行局部的調整，以盡量緩解、減少年齡結構急劇老齡化帶來的過多的負面影響。如南通地區生育率的調整顯然有助於諸如養老等許多問題的解決。

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南通市在目前的超低生育率水平下，生育率愈低，對人口結構的危害將愈嚴重。在南通目前的情況下，那種既嚴格控制了人口數量，又改善了人口結構的說法，僅僅是人們主觀上的一種良好願望，實際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六）人口紅利與人口虧空

人口轉變理論告訴我們，人口再生產類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模式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模式的演變過程中，出生率的下降速度和人口老齡化的速度不是同步發生的，前者先於後者發生，前者與後者也是原因和結果的關係。在生育率下降的初期，由於人口再生產的慣性作用，孩子數量下降的速度會快於老年人口增長的速度。在這一人口變動過程中，會形成一個有利於經濟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也就是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在一個時期內都比較低的局面，並且這個時期在人口進入老齡社會之前，會持續很長時間。總人口「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而且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年齡結構的這種變化將帶來勞動力增加、儲蓄和投資增長、人力投資增加和婦女就業機會增加等，從而對社會經濟發展十分有利，人口學家則稱這段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或「人口紅利」（于學軍，2003）。

人口紅利也即人口負擔輕，是生育率與死亡率變化後，人口年齡結構在某一特定時期出現的一種人口現象，是支付上出現錯位的結果。因為在每個人的一生中一般都會經歷少兒期、成年期與老年期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並將大致分屬於消費人口、消費和生產人口、消費人口。今天的人口紅利很可能意味著未來的人口「虧空」。

無論從少年兒童扶養比，老年人口扶養比，還是從總扶養比上考察，我國目前都處在勞動人口負擔最輕的一段時期，也就是我們正在分享所謂的「人口紅利」。國外甚至有人將中國的高經濟增長歸結為中國目前的人口紅利。但中國目前人口紅利的形成或產生是建立在二十世紀50—60年代的人口快速增長與70年代以來人口控制取得巨大成效的基礎之上的，是前人超額付出後的一種收益（可看作前人對生育投資的一種回報，有前人栽樹，後人乘涼之意），也是過去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一種回報，還是現代人減少對生育投資的必然結果（如生育數量的減少，必然導致家庭與社會用於養育子女的費用相應地減少），同時還應看作是現代人對未來的一種預支或透支（如現代人將本來應用於對生育投資的部分改用作生產與消費）。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人口紅利部分是要我們未來償還的（對未來的預支部分）。具體由三種人來償還：一是由下代人來償還，其結果是加重了下一代人的負擔；二是通過轉移支付，也就是通過人口遷移的辦法，由移民來償還；三是人口紅利的享用者償還，其結果是這部分人在年老以後的生活質素因此而下降。

那些在推行計劃生育以後生育孩子的父母，由於生育數量的減少（與他們的父母相比），使得他們撫育孩子的負擔相對減輕，因而他們從少生孩子中得到了許多「受益」，特別是獨生子女父母更是如此。但是投入與產出是對稱的，沒有投入，就不可能有產出。對生育投入的減少，意味著將來從子女那裏得到的「受益」也隨之減少。當推行計劃生育時期生育孩子的父母進入老年時，特別是獨生子女父母進入老年時，將不再能像他們的父輩那樣從子女那裏得到那麼多的生活照料與精神慰藉，其結果是增加對社會的依賴，這對老年社會保障提出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嚴峻的挑戰。

同樣，嚴格的人口控制，使家庭子女數急劇減少，在城市與少部分農村地區獨生子女大量湧現。這部分獨生子女在其童年與青少年時期得到了來自父輩、祖父輩的過多的關愛，也就是分享了人口控制所帶來的種種好處，即提前分享了人口控制的紅利。但是，這紅利中的部分是需要在今後的人生中逐步償還的。一方面，當這部分獨生子女進入生育年齡以後，無論是在經濟的供養方面，還是可資利用的家庭人力資源供給方面，他們都將面臨父輩們從未有過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面，現實的種種壓力與生育觀念的代際間傳遞與演進，使得他們更傾向於少生或不生孩子。而當他們年老以後，來自於子女的生活照料與精神慰藉將因此而大大減少。因此，獨生子女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快樂的童年與青少年，負擔沉重的中年與孤獨淒涼

的晚年。

（七）人口問題與矛盾的地區間轉移

中國人口控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一些負面效應也接踵而至。伴隨著人口的遷移與流動，中國人口控制所帶來的某些負面後果也將會同時在地區間發生轉移。也即發達地區將人口控制所帶來的一些負效應轉嫁給貧困落後地區，貧困落後地區在將來不僅要承擔起自身人口控制所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而且還要接受發達地區所轉嫁來的負面效應。當然，這中間也包括城市向農村的轉移問題。例如人口老齡化問題。雖然中國人口的老齡化首先出現在城市，但由於人口遷移與城市化，使大量農村年輕人口在流向城市的同時，還存在少量的老年人口因退休等原因而流向農村，其結果使城市人口老齡化速度及其老化程度得到了緩解，而農村地區卻出現了加速的傾向。儘管農村婦女生育率高於城市，但也改變不了這樣的趨勢。再加之城鄉社會經濟發展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異，未來中國農村將遇到比城市更多的老年人口問題。再如，由於婚姻擠壓矛盾的地區間轉移，許多貧困地區男子的結婚機會將因此而被剝奪。因此，落後就要挨打，不僅僅體現在軍事方面，還體現在包括經濟在內的所有方面（陳友華，2003）。

（八）人口負增長

人口規模的急劇擴大或急劇減少都很容易產生一系列嚴重的人口問題，而這其中的許多問題，如人口迅速減少的社會經濟後果，人類迄今還了解不多。由於我國的人口過多，因而人口數量適當減少一點，也即人口的負增長在未來一段時間內與在某種意義上是我們為之奮鬥的目標。但我們追求的是一種人口的逐步與緩慢地減少，而不是人口的急劇減少。

人口的發展主要取決於生育率、死亡率與人口年齡結構本身，而在三個影響因素中只有生育水平是可控制的。長期的超低生育率意味著人口內部已潛藏著人口迅速減少的巨大動力，這種力量大約在二十年後陸續爆發出來。由於超低生育率的時滯效應，當人口的慣性增長一旦停止下來以後，會出現人口加速較少之勢。長期維持超低生育率水平的上海等大城市與南通等少部分農村地區的戶籍人口已經開始出現加速減少的趨勢。因此，一方面如何應對人口規模的急劇減少給社會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諸多嚴重問題，另一方面為減緩未來人口規模急劇減少的趨勢，調整現行的生育政策，並努力使生育率逐漸回復到略低於更替水平，是以南通為代表的超低生育水平地區今後必須嚴肅面對的重大問題。

參考文獻

- 1、翟振武：〈中國人口規模與年齡結構矛盾分析〉，《人口研究》，2001年第3期。
- 2、張純元：〈完善生育政策的曙光——對山西省冀城縣試行兩孩生育政策的若干思考〉，《人口與經濟》，2000年第3期。
- 3、李建新：〈穩定低生育水平與生育政策平穩過渡的最佳時機：中國人口政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人口研究》，2000年第4期。
- 4、張純元、裴昆麟：〈承德市實行二孩生育政策的啟示〉，《人口研究》，2000年第4期。
- 5、左學金：〈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口展望，新世紀中國人口問題展望〉，《人口研究》，2000年第1期。

- 6、于學軍：〈中國人口轉變與「戰略機遇期」〉，《中國人口科學》，2003年第1期。
- 7、陳友華、陸建新：〈中國生育率的地區差異及其政策選擇〉，《人口與經濟》，2003年第4期。
- 8、陳友華：《中國與歐盟婚姻市場透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陳友華 1962年生，德國馬爾堡大學哲學博士，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四期 2004年3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四期（2004年3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